

Globethics Repository



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thic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罗, 蔚
Publisher	中国伦理学会,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0-31 05:39:3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1941

罗蔚：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罗蔚

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罗蔚（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工作站讲师，广东 510275）

【内容提要】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当代伦理学中反主流规范伦理学中的一支。它将女性身份作为反思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符号代码，试图以性别分析方法剖析伦理学领域内性别权力的运作，以结束使女性受压迫的伦理意识和谋划，达到更合理的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同时它批判了规范伦理学的普遍主义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质疑了主流伦理理论的基本预设与价值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探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代伦理学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女性主义的探究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关键词】女性主义伦理学/性别分析/理论旨趣

一 女性主义伦理学兴起的理论背景

自近代以来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形态从古典伦理学转向现代伦理学，康德道义论伦理和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被认为是十八、十九世纪现代伦理学的主流模式。这种理论模式的基本理论形态是规范主义伦理学，尤其是功利主义伦理以自然的事物如快乐、幸福来定义道德价值、道德的善，来寻求人类的道德行为规范，其理论模式通常被视作规范伦理学的主要代表。到二十世纪初，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发表，指出以往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谬误，他从语言分析的进路开创了元伦理学，力图寻求清楚明白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语言的表达。以此为标志，元伦理学的研究成为二十世纪前期伦理学形态的主流模式。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人们纷纷感到伦理学的语言分析模式脱离了道德生活的实际，它使伦理学研究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理论探究。六、七十年代英美伦理学界出现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现象，伦理学研究的注意力被重新放在为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寻求指导原则上。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是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探究之风重现的标志。他对传统规范伦理学做了修改与补充，发展了一种新的正义论的解释，他把伦理学从纯逻辑语言分析回转规范伦理学轨道上来，将伦理学的主题放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正、正当合理与公正秩序等近代西方伦理学的基本范畴的探究上，其正义论伦理构成主流伦理学的代表理论。之后不久，1982年，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的发表，又促进了伦理学的一个新发展。麦金太尔指出，现代以来的伦理学研究过于狭窄地注重僵硬的规则的制定，而忽视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内在德性的追求。针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规范伦理理论形态，麦金太尔提出返回到历史与传统中去，在道德共同体中寻找对道德的理解的观点，他主张用“美德伦理”代替“规范伦理”。当代道德哲学在批判反思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上，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进路对其进行思考，伦理学的探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思路面对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伦理理论范式。

在当代，现代西方文化经历着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各种活跃着的思潮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带给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伦理观念进行反思。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的伦理学学术流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兴起。女性主义将道德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性别化存在”的历史范畴中考察，对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与伦理观念进行把握与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女性主义作为方法论原则运用到伦理学的研究中，形成一个重要的伦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的女性主义伦理学著作问世，其中，以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年发表的《不同的声音》为代表，引发大量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以

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有方法，对伦理学问题进行探究，逐渐发展形成当代伦理学中独具特色的反主流规范伦理学中的一支奇葩——女性主义伦理学。就如福柯对癫狂、性、医学等似乎是非哲学的问题进行哲学探索一样，女性主义从似乎不属于伦理学问题的性别问题着手进行伦理学的探讨，表达女性主义在伦理学中的要求和伦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在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作《不同的声音》发表后，一些伦理学家运用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对西方主流道德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她们通过对道德认知发展阶段、道德推论的结构、道德原则的来源等问题进行探究，提出女性主义的道德思维模式——关怀伦理，这种关怀伦理理论，动摇了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契约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论证方式，同时也赋予道德以新的内涵。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理论建立起的道德推理机制与道德行为程序，对西方主流规范伦理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实践模式与新的伦理理论形态。它在揭露西方主流伦理理论产生压迫性的过程中，批判了规范伦理学的普遍主义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质疑了主流伦理理论的基本预设与价值建构。在当代伦理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女性主义的探究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所以，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女性主义伦理学在美国的变化很大，首先，它被非女性主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中的边缘，作为应用伦理学来审查规范理论和原则的涵义，是女性主义活动家为了保护公共事务受公正处理的行动，但是，现在，像贾格尔(Alison Jaggar)认为的那样，它不仅扩大了伦理领域，而且它带来了道德认识论的深刻思考，那是非女性主义伦理没有足够表达的。”[1](P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抱负是要重建伦理话语，发展新的不依赖传统道德哲学认识论基础的伦理学说。

二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建构方法

女性主义本身先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产生的最初动因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女性发现自己仍处于社会权力系统之外，并没有得到启蒙运动许诺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口号的兑现。女性主义先驱者们号召女性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实现男女平等而努力抗争。女性主义理论来源于女性解放运动，它从关注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实的状况开始，以性别差异为分析视角，对性别身份的范畴进行考察，探究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寻求其解决的途径。尽管不同的女性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和解释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提出有关实现女性解放的不同理论。但她们的不同理论建构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她们“都以承认现存社会结构是男权的，即女性权益服从男性利益的权力结构为理论的出发点。”[2](P61)女性主义学者都承认女性在社会、家庭中处于不平等的从属地位，她们揭示，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看，女性在历史语境中，在社会文化地位上，一直处于社会低层的状态，是被社会权力中心拒绝的“边缘人”，没有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力。女性主义学者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虽然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也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像有人认为是，女性主义只是一味地散乱地提出“反对歧视女性”的口号与观点。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它已经从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并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一些伦理学家将女性主义方法论引入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建立起女性主义伦理学，批判伦理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建构，关注当代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女性主义伦理学首先不满于伦理学中对女性性别歧视的不公正的道德态度，进而从性别差异入手，将性别身份作为道德问题分析的范畴，揭示伦理学的父权制结构与伦理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以性别身份为分析范畴，对女性身份进行了考察，揭示女性身份是承载社会价值观念的概念，它反映了父权制性别机制赋予给男性性别权威的权力运作。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力图表明，男女不平等、女性受歧视并不是简单的性别关系之间的错误建构问题，这种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实际上透显出一种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根源在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相互交织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失误。所以，女性主义要以女性身份为分析的范畴，剖析在伦理学领域内性别权力的运作，揭示父权制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的基础内容与道德价值体系的影响。

从女性主义的视阈看，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文化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都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是以性别身份为标志的二等公民。著名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就向人们揭示，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只是一些没有主体性的物体，它是作为一种对象存在于这个男性化社会中的。女性主义将性别关系纳入政治问题的领域，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女性主义在女性从政、家庭暴力、就业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视角，它力图建立一种女性语言的设想让人深思。

对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来说，她们的目的是要从女性的生存形式上，来分析现代伦理文化的问

题所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相信，任何一种道德体系都能从它的建构者的哲学思想中追溯到它的根基。而长久以来，道德哲学的主要建构者是男性，他们以男性体验为根基建构了道德哲学。相对于长时期的道德哲学领域内，男性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女性主义采用的方法是，要建构一种伦理学的女性系谱，以反映那些处于被主流抛弃状况的生存形式的思考。但是，“她们并不是追求‘为女性’的‘女性哲学’，而是在男人们已热衷于现代化故事的情形下，探究与她们自己的体验相符的语言——即可以将她们自己的体验作为普遍性体验来告诉人们的哲学语言。”[3](P69)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是要尝试通过熔铸在女性身体里的经验，来讲述一种新的有关伦理学的理解，因为在她们看来，西方主流伦理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的公共话语方式，反映的是父权社会中男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用性别意识的自省来摧毁伦理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建制，拒绝那些导致女性受压迫的道德规范与准则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它要揭示传统伦理话语是如何制造出那些含有压迫性的道德规则的。

三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关注主题

女性主义伦理学自兴起以来，对道德问题的关注由要求女性的政治权利层面转向文化批判的层面。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时常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表达话语中。后现代主义旨在解构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否定客观普遍的真理话语，而代之以局部性的、多元的真理。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顺应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真理观、道德观的挑战，因此，常常被归于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中。但是，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认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是循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关注问题的哲学的一面，他们的出发点是创造出一套反基要主义哲学的观念，并在这套观念的基础上获得关于社会批判形态和性质的结论；而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哲学问题相对于社会批评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他们的出发地点是创造出一套批判的政治观念，并在这套观念的基础上得出有关哲学立场的结论。由于在关注重心和方向上的这一差异，这两大思潮形成了一种强弱互补的格局。”[4](P127)她们的观点表达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反思对象，都是现代性启蒙思想，但针对相同的目标，两者批判反思的理论进路并不一样。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思考可以说是力图消除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探讨的不同方向，将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的探究联系起来。一方面，女性主义伦理学坚持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认同“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她们对被社会政治排除在外的家庭私人生活领域的生产与实践活动进行考察，重新将其纳入人类道德实践的中心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关怀思维的道德实践模式，在改变原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关怀伦理范式。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伦理学从对女性身份范畴的分析，揭示了道德哲学的“道德自我”、“道德自主性”等基础概念与主流道德理论的理论建构前提与预设，都以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为指导。女性主义伦理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一道构成对哲学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解构。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宣称，以往伦理学不仅贬损女性的道德能力、忽视与女性相关的道德事务，而且它对道德能力的基本理解、对道德相关事务的界定，都是以男性身份价值为标准的。所以，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不是论证女性如何成为像男女那样的道德主体，而是思考如何重建一种能体现女性价值、不漠视女性利益的道德理论，这一直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中心话题。

一部分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从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思考中，探寻另一种道德思维的模式，为创立一种能体现女性差异、消除压迫性存在的伦理学理论而努力。也有其他一部分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汲取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础进行解构。在此探究过程中，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考察了以往伦理学的偏向，不仅揭示了以往伦理学对女性的不公正态度及其父权制的结构，而且还对这个理论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了它过分地依赖于近代“主体哲学”的预设，将道德主体当成是独立、自主、分离、理性的范畴，把道德推论等同于道德主体寻找一套普遍有效的原则和规则运用于道德情境的过程。女性主义不满足于这个解释，对道德推论的核心概念，如道德中的自我、自主性等，进行重新解释。女性主义的视角提供了构成道德判断基本成分——自我、他人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思考。这反映出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人本身以及世界关系的新认识。

四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伦理学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伦理学内容的增补工作，它所做的并不是将遗漏了的、与女性有关的道德事务填补到伦理思想史中去。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艾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就明确指出：“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简单地将女性加入现存理论并加以搅拌。相反，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新的观点是，重新思考伦理学最深的问题——什么是道德事物，通过什么

手段它能得到解决——这是独特的女性气质所观察到的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bility)。”[1](P182)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原有道德哲学的范畴和结构并不适于女性经验的表达,对女性经验进行道德思考是有价值的。所以,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探究并不是仅仅要求在伦理理论的内容中添加女性道德生活的历史和她们的经验,而是寻求以女性的道德经验的方式改变伦理学的建构基础。

女性主义伦理学认为,有关道德理解的讲述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意识到讲述思想的新的立场。女性主义将对女性身份的思考与现代伦理文化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女性身份”负载的价值内涵、意义与探究道德理论建构的内容、结构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的独特解释。根据女性主义的阐释,我们认为,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将现代性道德困境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在启蒙的现代性伦理精神的转换过程中,遭受到父权制社会建制对整个伦理体系的成功入侵,造成现代伦理学发展的偏向,“现代性伦理”精神的价值论证方式有内在缺陷。由于这个内伤,其“合理性”的论证在当代遭到人们质疑,产生对“现代性的道德危机与困境”的进一步反思。

“当西方思想家们审视西方现代性问题时,对作为一种现代价值和伦理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怀疑与批判也开始突显出来。”[5](P1)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同样思考的是,西方社会主流道德价值体系是否真正有利于人们的幸福?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改善还是在摧毁人们的生活?从这些问题出发,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启蒙伦理谋划提出异议,并在原有谋划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解,对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原则自主性进行了重构。女性主义正是对西方现代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伦理精神的反思,在此进程中,女性主义改变启蒙伦理精神的价值论证方式,从特定、具体的关系的自主性中论证道德的构成,为道德价值的理解提供新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形成道德理解的不同视野与内涵,也看到原有道德理论的不足。它对启蒙人道主义伦理观有关人的本性的预设提出质疑,并挑战了现代伦理寻求“合乎理性而又普遍公正的道德原则”的主题,这揭示了一种伦理学上的新思维路径,为现代性伦理困境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和视阈。

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相信,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压迫性根源的分析,可以导致对所有产生压迫的结构阐释。女性主义伦理学探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将女性身份、女性生存状态作为反思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符号代码,试图以性别分析方法挑战以往伦理学领域的主流思维模式,以结束使女性受压迫的伦理意识和谋划,达到更合理的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所以,我们面对新兴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派,更重要的是关注它如何建构关怀伦理范式,以及分析它对当代道德实践和伦理学建设的影响与意义。

笔者认为,应该在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及其问题的论争背景中,来理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旨趣与价值取向。女性主义伦理学并非是以女性为研究领域的伦理学分支学科,而是一种以女性主义为方法论、以性别为分析范畴进行的伦理探究。认为女性主义伦理学是要将伦理学分为男性伦理学或女性伦理学的解释是一种误解,女性主义伦理学并非探究与女性相关的道德问题的部门伦理学,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代表了当代生活背景中一种道德实践反思的理论形态。它虽然大多谈论女性的问题,但像女性主义伦理学家表述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女性主义伦理不是有关性别的伦理事务,相反,它不局限于研究传统伦理范围内的道德问题,而是将传统伦理范围扩大,用女性主义方法分析已有的但没有被伦理学关注到的道德事务。”[1](P86)这启示我们从以往伦理学所忽视的道德事务和道德问题出发,考察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本质内涵。所以,本文指出,女性主义伦理学关切的并非狭义的女性道德权利,它不是有关女性道德问题的清单,不是只关注性别的伦理学,它更多指向的是伦理学本身,关注针对所有人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在当代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Claudia Card ed.:Feminist ethic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2]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上海:三联书店,1995.

[3][日]北川东子(赵玉婷译).齐美尔:生存形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5][美]麦金太尔(万俊人译).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